

跨文化研究的三个概念综述

◎余卫华

在国际交往日趋频繁的今天，跨文化研究已经成为热门学科。在修订出台的《外国语言文学类国家课程标准》（简称国标）和各种外语类教学大纲中，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俨然已经成为外语教学的目标之一。其实，跨文化研究属于典型的跨学科研究，不仅在外语教学中需要了解跨文化现象，而且在人类学、历史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和外交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也要开展跨文化研究，譬如对身份认同的研究以及国际公民意识的研究等。本篇文章主要介绍跨文化研究的三个相关概念的界定和综述，不涉及具体的跨文化交际过程和案例分析。

1 文化的界定

跨文化研究必须熟悉目的语文化，这一点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了解目的语文化必须首先清楚文化的界定和内涵。尽管文化的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学者们对于文化的定义已有不下数千种，因此要正确界定外语教学环境下的文化内涵是不容易的，其中英国著名文化研究的学者 Goodenough（1964:36）对于文化的界定是引用得最为广泛的定义之一：“特定社会的文化由该社会所必须了解或信仰的东西构成，目的是能够以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方式实施。文化并非自然现象。它并非仅仅包含事物、行为和情感，而是这些方面的有机结合（譬如，风俗习惯、行为举止和思维模式等）。文化是社会成员头脑里固有的东西的成形，是他们观察和联想的模式以及不同的阐释方式。”

根据 Goodenough 的界定，文化是特定群体共享、共同商定的特定知识，属于特定社会中的所有人，并不因个人或个体而特有。文化人类学的学者 Hofstede 具有影响力的经典论断强调了文化知识的系统性和传承性的本质。“文化是具有历史传承性质、以符号为象征的意义模式，是以象征形式表述的概念传承系统。特定群体以这种模式和系统为媒介进行交流，传承并发展他们对于人生态度的认识”。（Hofstede, 2010: 89）文化中的大部分知识以人类物质遗产和行为方式等通过象征意义表述出来，并以规则、典范、期望传承遗产、道德和法律准则、谚语、父母对后代的指示等方式系统地确定下来。大部分文化知识都是心照不宣的，很少人会主动意识到它的存在，除非有人做出了难以意料或出格的事情。

Taylor 认为文化含义中的很多范围有些是确定的，有些是没有确定的。这些范围远

远超出个体之间的共有和分享。文化的含义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含在社会现实的常规和惯例中。隐含在这些常规惯例中的文化含义和规范并非存在于行动者的意识中，而是长期存在于这些常规惯例本身之中。这些常规惯例不可能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来自行动者的系列个体行为。它们主要是社会关系和相互交流的不同模式。(Taylor, 1971: 27)

从上面 Hofstede 和 Taylor 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是人类个体赖以生存的文化含义的模式或者说是关系网。Taylor 以文化交往中的“协商”(negotiations)为例，指出个体行为被看作“协商”“终止协商”“提议”等。这些协商被看作对于构成整体活动规范的遵从。这些规范并非仅仅存在于个人的头脑里，而是都具有相互理解的含义。继 Taylor 之后，Hofstede 还提出了文化中更多的属于社会现实的一部分的意义范围，譬如：“共有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够体现文化的物质遗产(artefacts)。他说：“我所指的共有意义其概念的重要性，首先是其共有性不仅在于人人拥有这些含义。共有性的含义更应该体现在身处在一个共有的参照世界里。”(Hofstede, 1973: 30)

Hofstede 所提出的例子的含义是说：讲法语的群体人士所具有的民族身份认同的生存概念同样也是加拿大魁北克人所能理解和共享的共有意义。Taylor 接着将这种共有意义与社区群体概念联系起来：“共有意义是社区群体的基础。跨主观的含义使人们有一门共同的语言来讨论社会现实。”(Taylor, 1971: 30)

上述观点其实提出了民族身份、民族认同和民族统一性的存在和生存问题，譬如法语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就是“共有意义”。百合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的共有意义是“百年好合”，而在西方文化中它的共有意义则是“纪念逝去的亲人和友人”。

虽然文化是特定社会的共有意义，而且不仅仅是群体所通用共享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文化绝非是静态和同源的，而是永远动态、发展的。文化的特征和变化必须适应新的不同的社会和环境的需求。因此，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是一个持续不断、永远向前的过程。(DeCapua and Wintergerst, 2004) 本族语与目的语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是促使文化发展的因素之一。

美国的一些跨文化研究的学者(譬如 Chastian, 1976; Seelye, 1994)将文化界定为大文化(Big Culture)和小文化(Small Culture)，有点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大文化是指整个社会的主要产品和贡献或者是特定社会里杰出个人的主要产品和贡献。在学习大文化时，语言与文化的专业学生主要研究特定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以及该国的伟大政治家、杰出英雄、作家和艺术家等。小文化主要是对特定群体开展人类学研究、及研究特定群体的特定生活方式。通常语言与文化专业的学生与不同文化开展跨文化交际时主要产生直接关系的大多数便是小文化。小文化通常也是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核心内容，通常包含三个方面：特定文化群体的思维模式、群体成员之间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Seelye, 1994)

对于语言与文化专业的学生来说，了解一点美国人 Sapir 和他的学生 Whorf 在 20 世纪提出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ian hypothesis)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个假说谈到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语言的学习是不能与文化的学习割

裂开来的；如果不了解使用这门语言的特定人群的文化，那么我们是不可能学会使用该门语言的。（Kramersch, 1988 : 63）他们的这种假设对于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学习既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引起了很大争议。譬如，在如今的全球化和国际化时代，英语已经成为一门国际通用语（ELF :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现代英语已经有了各种变体（World Englishes）（Graddol, 2010），那么仅仅学习英美国家的社会与文化就远远不够了。

“文化”一词在中文里也是一个自古就有的词汇。“文”指各色交错的纹理，隐身为语言文字的各种象征符号，伦理修养以及德善美的品德。“化”的本义为改和易、生成造化等。西汉以后，“文”与“化”方合成为一个词。（张岱年、方克立，2004 : 3）其实，中文里的文化一词主要专注精神领域，强调遵从礼仪、伦理与道德，有学识，有修养，“以文教化”，而英语中的“culture”则有着更为广泛的意义。

2 文化研究及其综述

文化研究是对文化现象（产物、过程、问题）开展多学科或跨学科分析。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起源并发展于英国，在过去几十年内传播至世界各地及其他各门学科。

Richard Hoggart 和 Raymond Williams 最先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了文化研究这个术语。他们沿承了英国文化批评的传统（如 Matthew Arnold, T.S. Eliot, I.A. Richards, E.R. Leavis 等），并加以扩展、改变，使文化概念民主化和平民化。研究重点不再是上层或精英文化，而是注重社会文化的多样性。这一视角的改变归因于 20 世纪二战后全球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诸多转变。这些转变包括英国社会福利状况的扩展（譬如福利国的出现）、劳工阶层的中产阶级化、劳工党当权、大英帝国的衰败、越来越多接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权利，以及多元文化的英国社会的形成。

英国的文化研究的开始、发展和制度化源于一些基础性文章。（如 Hoggart, 1957 ; Williams, 1977 ; Thompson 1963, 引自 Kramer, 1997）这些文本试图阐述和解释上述诸多转变。Richard Hoggart 于 1964 年建立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从事文化研究并对相关问题开展理论和实证分析。在 Hoggart 的管理下（1964—1968），该中心致力于文学和文化社会学问题的研究。在 Stuart Hall 的管理下（1968—1979），该中心则集中于有关媒体文化、流行文化、青年和工薪阶层文化、女权主义、种族主义等问题的研究，同时，理论和意识形态也被加入研究议程中。这些研究采用不止一种特定理论研究模式：法国结构主义（Saussure, Levi-Strauss, Barthes）、新马克思主义（Lukics, Althusser, Gramsci），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学派等（Williams, 1977, 引自 Kramer, 1997）。这些模式当时都具有相当影响力。直至 1979 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才跟大学的英语系联合起来。当 Hall 离开该中心加入英国开放大学时，该中心在 Richard Johnson 的领导下变成了一个人文社科学院下面的独立的研究单位。1988 年，该中心和社会学系合并成为商业和社会科学学院下的文化研究系。

尽管有着类似兴趣的其他组织和机构在20世纪60年代也开始存在,并且它们也对文化研究做出了很大的学术贡献(例如利兹大学的电视研究中心,莱斯特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格拉斯哥媒体学会),但是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通常都是把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相提并论。大约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自主招生和自主学习机会的来临,国际学生的需求还是催生了各种文化研究和课程的建立和开设,首先在一些理工类大学,其次是其他大学。从1982年到1987年,开放大学开办了一些流行文化的课程,由一些学者和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开设,最终极大地影响了英国和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Bassnett, 1997)

至此,英国的文化研究受到世界各地的欢迎。(Kramer, 1997)与此同时,根据美国(Nelson and Grossberg, 1988; Grossberg, Nelson and Treichler, 1992),澳大利亚(Turner, 1992),中国台湾(Chen, 1992),意大利(Baransky and Lumley, 1990),德国(Kramer, 1997),欧洲的其他国家(Journal of the Study of British Cultures, 1999)以及世界各地(British Studies, 199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998年起至今)的具体需求,文化研究与各地不同的特定环境下的本土传统和文化相融合,对各国的教学和研究产生了作用。差不多也在这个时段,文化研究被引入(或被再次引入)外语教学(Buttjes, 1981; Byram, 1989; 引自Kramer, 1997)和其他国际科目的教学中(Aronowitz and Giroux, 1991)。

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研究呢?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即特定群体共享意义的输出、传播和吸收的方式、地点、时间和效果是怎样的呢?可以用一个文化圆圈来表示,圈中的五个方面是:表征、产生、吸收、认同、规范。

(1)表征:含义只能因为人类拥有两个互相依存的表意系统而产生。第一个系统使我们把世界的事物和我们头脑中的概念联系起来;另一个系统使我们把头脑中的概念与特殊的符号或符号系列联系起来。事物、概念和符号的关系是语言意义产生的核心。我们把这三个因素联系起来的过程叫作“表意”(Hall, 1976: 19)。

(2)产生—吸收:个人、集体和社会机构输出并传播意义;但在吸收的过程里也会产生意义:人们听音乐,读文章,看电影,穿衣服,参加聚会等。通过这些事情,人们赋予代表他们身份的这些文化产品特定的意义。

(3)认同—规范:通过输出共享意义,群体成员产生身份认同感。这些意义可以作为一种规范手段:当这些意义通过包含或排除其他意义而起作用时,它们赋予群体身份和认同特定的规范。

在文化研究中具体运用何种理论和方法具体分析以上问题并未达成共识。在最好的文化研究中,创造性的折中主义最为流行,它集合了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心理分析、性别研究、女性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相对论、文化唯物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等。因此文化研究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

尽管人们对于文化研究在多样化和多学科方面为什么经历了如此的流行度和发展趋势这一点都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当那些所谓的自明之理的意义不

再是不言而喻时，对文化的讨论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下所提出的文化研究流行的原因可以窥见一斑：（1）当 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遗症逐渐消失，社会和心理资源再一次得以充实时，人们越来越对人性化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感兴趣。这就促使人们可能再一次去反思、探讨和彻底改变那些曾经无法与法西斯和战争抗衡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在欧洲，这些过程逐渐从“人性的危机”中显现出来，也再一次表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学生动乱及相关的政治、文化转型之中。文化研究分别对学术观点以及整个一代人的政治和文化观念产生了影响。（2）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移民到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数逐渐增加。在当时的社会，这些移民并未被认为是影响政治文化的因素，但是他们至少微妙地影响了关于文化和政治的讨论。当这些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进入学校时，他们对欧洲政治文化的统一就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3）很巧合的是，美国在文化研究成功发展的同时，丧失了控制全球经济的能力。人们也意识到美国再也不可能为了确立自己的大国地位而建立“世界新秩序”了。（4）从全球视角来看，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过程给文化研究带来了一场必然的持久的探讨与思考。

3 文化差异与文化模式的综述

一些跨文化研究的学者 [譬如美国学者 Hall (1976) 和荷兰学者 Hofstede (2010)] 认为，文化是一个特定环境中的人们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区域或国家的这种程序互有差异。他们认为东西方文化的文化差异基本可分为六个维度：高低语境文化 (low versus high context cultures) ，高低或大小权力距离 (high versus low power distance)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 ，男性度与女性度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 (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 ，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避免 (certainty versus uncertainty avoidance) 以及短期与长期价值观念取向 (short term versus long term value orientations) 等。

3.1 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 (high context culture versus low context culture)

你可能会发现不同地方的人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有不同的表露程度。在低语境文化 (low context culture) 中，人们常常被要求直白地表露自己的意思，不要拐弯抹角、婉转其辞。低语境文化下的人们更看重人的自我表达、个人观点的陈述还有说服他人的能力。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低语境文化国家。而加拿大、以色列还有大多数的现代欧洲国家，都属于这样的文化国家。

而在高语境文化 (high context culture) 的国家中，人们从小被教育说话要婉转，不能太过直接。除了中国人外，这样的人群包括了韩国人、新西兰的毛利人以及美国的土著人。在这些社会当中，保持社会的和谐、防止与他人发生冲突等显得更为重要一些。

因此,人们讲话会更加婉转,行为也会更加谨慎,他们往往通过脸部表情以及声调等更加微妙的行为信息或语境线索来表达自身的意思。

从人们处理批评和反对意见的方式中,我们可以一窥这种文化差异对沟通行为的影响。在低语境文化中,上司可能会公开严厉地训斥一个不负责任的下属,拿他来做例子,以儆效尤。这个上司可能会毫不顾情面地揭露下属的错误,同时也会直截了当地说出希望对方改正的地方,以及如果再达不到期望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等。

然而,在高语境文化中,这个上司可能会顾着下属的“面子”而不当众训斥他,相反,上司更多地会在私底下向下属提出批评,同时会选择一些婉转的语言来表达批评的意思。他不会直接说出下属哪里做错了,但是他会通过“绕圈子”的方法引导下属自己发现错误。例如,一个员工经常迟到。在高语境文化中,上司不会直接针对迟到这件事情来批评他,相反,这个上司可能会不断强调同事之间的责任感,成为团队里面“拖后腿”的人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等。在这个时候,这个员工通过上司的语气声调、肢体动作以及脸部表情,应该能够明白其所想表达的意思。

你可能也会想到,当低语境文化背景的人到了高语境文化中,他受到误解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假设这样的一个情境。

你想邀请两位朋友明天晚上一同去一家十分受欢迎的书店咖啡厅喝咖啡。来自低语境文化背景的朋友蒂娜对你说:“不了,我明天晚上要学习呢,但还是谢谢你的邀请。”而另一个来自高语境文化背景的朋友小李对你说:“那很不错啊。”但是,之后你会很惊讶地发现他并没有如约去喝咖啡。

你是怎样解释这种行为上的差异的呢?在高语境文化中成长的人,他们很难对别人说不。即便是他们真的拒绝某事,他们也会因为害怕得罪别人而婉转其辞。与他来自同一个文化背景的人通过他的语音语调以及脸部表情就可能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他实际上并不太想去喝咖啡。但可能因为你生活在一个低语境文化中,你认为他没有直接拒绝即表示赞同,因而你会误认为他愿意与你一起去喝咖啡。

3.2 高低或大小权力距离 (high power distance versus low power distance)

权力距离即在一个组织当中(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中),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在企业当中可以理解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距离。一种文化究竟是大的权力距离还是小的权力距离,必然会从该社会内权力大小不等的成员的价值观中反映出来。因此研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就可以判定一个社会对权力差距的接受程度。

例如,美国是权力距离相对较小的国家,美国员工倾向于不接受管理特权的观念,下级通常认为上级是“和我一样的人”。所以在美国,员工与管理者之间更平等,关系更融洽,员工也更善于学习、进步和超越自我,实现个人价值。相对而言中国是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在这里地位象征非常重要,上级所拥有的特权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这种特权有助于上级对下属权力的实施。这些特点显然不利于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和谐关系

的创造和员工在企业中不断地学习和进步。因而要在中国的企业当中采纳“构建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以及“为员工在工作中提供学习的机会，使他们不断进步”这两项人本主义政策，管理者有必要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减小企业内部权力之间的距离，这样才会更好地实现管理目标。

3.3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

“个人主义”是指一种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中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松散，人人各自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集体主义”则指一种紧密的社会组织，其中的人往往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区分。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从出生开始就与强大而又具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一起，他们期望得到“群体之内”的人员的照顾，但同时也以对该群体保持绝对的忠诚作为回报。

美国是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强调个性自由及个人的成就，因而开展员工之间个人竞争，并对个人表现进行奖励，是有效的人本主义激励政策。中国和日本都是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员工对组织有一种感情依赖，更加容易构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

3.4 男性度与女性度 (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

男性度与女性度又通常翻译为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则完全与之相反。有趣的是，一个社会对“男子气概”的评价越高，其男子与女子之间的价值观的差异也就越大。美国是男性度较强的国家，企业当中的重大决策通常由高层做出。员工由于频繁地变换工作，对企业缺乏认同感，因而员工通常不会积极地参与管理。中国是一个女性度较强的国家，注重和谐和道德伦理，崇尚积极做事融入社会的精神。根据对 IBM 员工价值观的调查分析显示，女性价值观的差异性小于男性价值观；而且在男性化社会中，性别角色十分明确，即男性成员应该自信、坚毅，重视物质上的成功，女性成员则应该谦虚、温柔，注重生活质量；在女性化的社会中，性别角色常常发生重叠，即男女都应该谦虚、温柔，而且注重生活质量。

3.5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避免 (certainty versus uncertainty avoidance)

所谓不确定性回避就是文化成员对于不确定的或是未知的情况所感觉到的恐慌程度。这种不确定性给人们造成的恐慌表现为精神紧张或期盼未来的可预见性。不确定性文化的人们试图用科技来抵抗自然界的不确定性，用法律（成文和不成文）来抵抗来自其他社会成员的不确定性，而宗教则被人们用来化解不可抵抗的死亡和来世的不确定性。相对而言，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中，人们更注重情感，有一种高度的紧迫

感和进取心；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当中，人们倾向于放松的生活态度和鼓励冒险。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于不确定的、含糊的、前途未卜的情境，都会感到面对的是一种威胁，从而总是试图加以防止。防止的方法很多，例如提供更大的职业稳定性，订立更多的正规条令，不允许出现越轨的思想和行为，追求绝对真实的东西，努力获得专门的知识等。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防止不确定性的迫切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当中，人们普遍有一种安全感，倾向于放松的生活态度和鼓励冒险；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当中，人们则普遍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和进取心，因而易形成一种努力工作的内心冲动。

例如，日本是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在日本，“全面质量管理”这种员工广泛参与的管理形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终身雇佣制”也得到了很好的推行。与此相反，美国是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国家，同样的人本主义政策在美国企业中不一定行得通，比如在日本推行良好的“全面质量管理”，在美国却几乎没有成效。中国与日本相似，也属于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在中国推行员工参与管理并增加职业稳定性的人本主义政策，应该是适合的并且是有效的。此外，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人们比较容易接受生活中固有的不确定性，能够接受更多的意见，上级对下属的授权被执行得更为彻底，员工倾向于自主管理和独立地工作。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里，上级倾向于对下属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清晰的指示。

3.6 长期价值观念取向与短期价值观念取向 (long versus short term value orientations)

第六个维度的研究使用的是由中国学者设计的调查问卷，可以说是注重德行而不是真理。长期取向的价值观注重节约与坚定；短期取向的价值观尊重传统，履行社会责任，并且爱“面子”。这一维度的积极与消极的价值取向都可以在孔子儒家的教义中找到。孔子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儒家哲学思想家，生活于公元前500年前后。不过长期价值观念取向与短期价值观念取向这个维度也适用于没有儒家传统的国家。

在一些西方跨文化交际领域的学者看来，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偏向于高语境、高权利距离、集体主义、男性强势文化、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和短期价值观念取向，而西方文化则多多少少是相对应或相反的。

上面我们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对三个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和综述。这三个概念都是开展跨文化教学和研究所必不可少的。首先，作为外语教学的跨文化研究离不开了解特定的目的语文化。我们所研究的文化既不是单独的个体也不是脱离人类而单独存在的自然界，而是特定的人、社会与自然界的天地人的融合。所以目的语的学习必须融入特定的目的语文化，才能够做到“入乡随俗”。其次，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表征、产生、吸收、认同、规范”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是相互依存而又不可分割的一个循环发展的过程。跨文化交际过程也应该遵循这五个方面。最后，跨文化研究必须开展文化比较，而开展文化比较又必须了解文化差异和主要的文化模式。西方跨文化研究的学者

们在比较不同文化差异时提到了六大主要模式：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高低权力距离或大小权力距离，确定性避免与不确定性避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文化与女性度文化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以及短期与长期价值观取向等。尽管我们应该以谨慎评判的视角审视这六大文化模式，但是这些模式确实对于我们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过程是有一定帮助的。

参考文献：

- [1] Aronowitz S, Giroux H A. *Postmodern education: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al criticism*[M]. Minneapolis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 [2] Baransky Z, Lumley B. *Culture and conflict in post-war Italy: essays in popular and mass culture*[M]. London: Macmillan, 1990.
- [3] Bassnett S. *Studying British culture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4] Buttjes D. Culture in Germa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king use of an ambiguous past[C]//Byram M, Buttjes D. *Mediating languages and cultur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1.
- [5] Byram M. *Cultural studie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M]. Clevedon and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1988.
- [6] Chastain K. *Developing second-language skills: Theory to practice*[M]. Rand McNally College, 1976.
- [7] Chen K H. *Media/cultural criticism: a popular-democratic line of flight*[M]. Taipei : 1992.
- [8] Crystal D.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M].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9] DeCapua A, Wintergerst A C. *Crossing cultures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M].2nd e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6.
- [10] Goodenough W H.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linguistics*[M].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64.
- [11] Graddol David . *English next*[M]. British Council, 2010.
- [12] Hall E T. *Beyond culture*[M]. New York: Anchor, 1976.
- [13] Hall E T. *Silent language*[M]. New York: Anchor, 1988.
- [14] Hofstede G, Hofstede G J.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M].3rd ed. Boston: McGraw Hill, 2010.
- [15] Hofstede C.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C]// Hofstede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by Clifford Geertz*.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 [16] Hoggart R. *The uses of literacy*[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7.
- [17] Kramersch C. *Language and cultur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 [18] Kramer J. *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M]. Frankfurt: Peter Lang, 1990.
- [19] Kramer J.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M]. Munich: W. Fink, 1997.
- [20] Nelson C, Grossberg L.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M]. Basingstoke and London: Macmillan, 1988.

- [21] Seelye H, Seelye N, Alan J. *Culture clash: Managing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M]. Chicago: NTC Pub. Group, 1994.
- [22] Taylor C.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ciences of man[J].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1971, 25(1): 351.
- [23] 张岱年,方克力. 中国文化概论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作者简介:

余卫华, 英国杜伦大学博士,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 稽山杰出学者(A2), 首届校级教学名师, 英语学院院长, 浙江省翻译协会副会长, 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语言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 浙江省省级特色专业(翻译)负责人。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 教育部学位中心论文评审专家,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十三五学科组专家, 浙江省社科联专家库专家。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一项、教育部重点课题一项、省级精品资源课程一项及省市厅级课题多项, 在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光明日报》《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外语电化教学》等权威核心学术期刊和专业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 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 30 多部。获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 浙江省高校首批“互联网+教学优秀案例”特等奖。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育。